

概 述

由于先民的辛勤劳动，从周秦时期开始，江苏的农业经济就比较发达。江河湖海的舟楫之利，也为当时的商业贸易提供了优越条件。唐宋以来，江苏就一直是全国的财赋重地。俗谚有云：“苏湖熟，天下足。”“天下大计，仰于东南。”19世纪末叶以来，江苏又成为全国工商业比较发达和集中的地区。江苏的教育事业从宋代开始得到大规模普及，逐步改变了传统的“学在官府”、“学在豪门”的状况，从那时起至今，教育事业得到持续发展。从明清时期历中华民国至今，江苏的印刷出版、图书销售收藏等事业在全国都居于前列。

江苏在历史上涌现出过许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艺术家、工商企业家、自然科学家，素以人文荟萃而享誉全国。境内分布着众多的历史名胜和文化古迹，蕴藏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江苏省省会南京市是座历史文化名城。先后有三国时期吴、东晋、南北朝时期宋、齐、梁、陈、五代时期南唐、明朝初年太平天国、中华民国10个政权在此建都。

优越的自然条件，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发达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为江苏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样，江苏社会科学事业也为江苏和全国的各项事业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科学智慧和理论生机。概而言之，古代江苏社会科学事业萌芽于春秋时期，发展于东晋、南北朝时期，兴盛于明清时期。降及民国时期，江苏是全国主要学术中心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江苏社会科学事业正步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时期，学术研究队伍人才济济，各种学术研究机构 and 学术研究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学科建设全面发展，各种学术著作硕果累累，学术讨论活动繁花似锦，学术社会服务道路越走越宽，

海内外学术交流日趋活跃，学术管理工作井然有序。

(一)

从公元前 5 世纪的东周中期（又称春秋时期末期）至公元 3 世纪的汉代，是江苏社会科学事业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全国学术重心在黄河流域，而江苏的社会科学活动或则是以黄河流域的学术文化为背景和舞台而进行，或则是接受了黄河流域的学术文化的辐射和影响而发展起来的。

吴馀祭四年（公元前 544）公子季札出使鲁国（今山东曲阜）请观于周乐。鲁国为西周著名政治家周公姬旦及其后人的封邑，因此被赐予了当时最完备和最高规格的礼乐系统。季札对乐工所演奏的《风》、《雅》、《颂》等乐曲及舞蹈一一发表了精湛的评论，这是我国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的美学批评。嗣后不久，言偃、子游北上鲁国，就学于孔子门下，以其文学方面的优异成绩而被誉为孔子学生中的七十二贤人之一。现存《礼记·礼运》篇就是孔子与言偃的对话录。孔子死后，言偃返回家乡常熟一带讲学，首开江南私人讲学之风。据《庄子》记载，著名思想家老子李耳也曾在沛县一带聚徒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齐国孙武也在这一时期来到吴国，向吴王阖闾献上他所著《孙子兵法》。孙武的军事理论有力地推动了吴国的强盛，破楚、伐越、北上争霸，皆有力焉。在孙武影响下，江苏地区迅速形成了一个包括伍子胥、文种、范蠡等人的“兵家”学派。三百年后，在秦末农民起义战争中，“兵家”学派又一次显示了它的威力与作用。项羽、韩信、张良、李左车等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导演了一出威武雄壮的历史剧，他们在军事学研究方面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可惜上述诸人的著作大多已失传。

西汉时期，汉高祖刘邦曾经就他本人夺取政权和人才使用的成功经验发表过言简意赅的见解。萧何主持制订的《九章律》为巩固和维护汉朝的法制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陆贾著的《楚汉春秋》是江苏最早的地方史。淮南王刘安在众宾客的协助下，编撰了著名的杂家著作《淮南子》。董仲舒在他任江都王相期间撰写了他的重要著作《春秋繁露》。这部著作提供的“天人感应”的封建政治大一统学说，为汉唐等王朝所采纳。刘向、刘歆父子为汉朝中央政府管理图书档案完成了《新序》、《说苑》、《七略》等重要书籍目录提要著作，被后人誉为“目录学之祖”。东汉王充在他的《论衡》里对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学说、谶纬神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对独崇儒学表示了不

满。东汉末年，来自西域的佛教高僧支谦访问了建邺（今南京），并在这里翻译了一系列佛教典籍，这是外国学者访问江苏从事学术交流的最早的记载。

从公元 222 年孙权称吴王于建邺，到公元 589 年陈被隋所灭，这一时期先后有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政权在南京建都，所以又称为六朝时期。六朝时期，江苏的社会科学事业出现了一次飞跃性的发展，造成这一飞跃的主要原因是晋王朝的南迁。由于当时中国北方地区长期陷于战乱之中，大批原来生活在北方的官僚贵族纷纷随晋朝南迁于江东地区。中国中世纪前期，教育事业不普及，受教育者相当稀少，从事学术研究更需要时间、金钱、图书资料等条件。因此，绝大部分学者都集中在中央政府里和官僚贵族阶层中，即通常所说的“学在官府”、“学在豪门”。东晋的建立和大批官僚贵族的南迁为江苏地区带来了一个素有造诣的学者群和良好的学术传统，导致江苏社会科学事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

东晋时期，朝野之间盛行“清谈”之风。“清谈”源于东汉末年的“清议”，其原来讨论的主要内容是官僚士子的政治品行、道德操守。晋时，过去独尊儒学的局面已被打破，讨论的内容转向了老（子）庄（子）哲学和儒学相结合后形成的玄学。所以“清谈”又称为“谈玄”。“清谈”主要通过辩论的方式进行，参加人数数人乃至数十人不等。双方各持一说，互陈己见，直至一方理屈辞穷为止。参加“清谈”的学者包括当时一些最著名的官僚、佛教僧侣，如王导、谢安、王羲之、支遁、殷浩、殷仲堪、王修、孙盛、王衍、乐广、卫玠、何承天等。自由地、平等地和频繁地进行各种学术流派、学术观点之间的交流讨论，是六朝时期学术界的一个特点。东晋、宋、齐、梁时期，江苏出现的比较重要的学术论争还有：在佛教僧侣竺道生和慧观之间展开的关于通过“顿悟”的方式还是“渐悟”的方式来把握佛教真谛的论争，在僧慧义和郑道子之间展开的按照印度佛教仪规“踞食”还是根据中国生活实际“坐食”的论争，在道教僧侣和佛教僧侣之间展开的两种宗教的“华夷之别”问题的论争。正是通过这些不断的论争，佛教渐渐被中国信徒所接受并且变得日渐中国化了。道教也获得了新的发展机会。以梁武帝萧衍、萧子良等人为一方，以范缜为另一方的关于“神（灵魂）”在人死后是否存在的辩论，是一场在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之间展开的著名论争。范缜坚持其“形神相即”、人死神灭的论点，体现了他的唯物主义精神。

六朝时期，江苏地区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理论著作。其中郭璞著的《尔雅注》、《方言注》是最早的江苏语言研究著作。沈约著的《四声谱》为后来中

国的格律诗创作奠定了音韵学基础。周处著的《风土记》是江苏最早的民俗学著作。葛洪著的《抱朴子》不但是道教研究的重要文献而且对政治学、伦理学等多有阐述。佛教天台宗的创始人智顓在南京完成了他的重要著作《摩诃止观》。颜之推著的《颜氏家训》开创了家庭伦理教育这一形式被誉为“后代家训之祖”。刘勰著的《文心雕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美学理论专著。陆机著的《文赋》是著名的骈体长篇文学研究论文。钟嵘著的《诗品》是优秀的诗歌研究著作。萧统主编的《昭明文选》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大型文学选本。沈约编著的《宋书》，萧子显编著的《南齐书》是官修正史中的杰作。刘义庆著的《世说新语》不但是文笔优美的笔记小说，而且忠实记录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历史、哲学、美学研究风尚。它们都对后来中国历史、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六朝时期，江苏地区与印度及西域诸国在佛学研究领域中的交流也相当密切。中国著名佛学家法显不远万里，前往印度求学，归国后来到建康（今南京）写下了反映他在印度等国求学经历的名著《法显传》。印度及西域诸国的高僧帛尸梨密多罗、菩提达摩、僧伽提婆、求那跋摩（功德铠）、求那跋陀罗、真谛等人也相继来到建康，他们带来了有关小乘、大乘佛教典籍，并在中国佛学家的协助下将其译成中文，同时，还向中国僧侣传授了印度佛教的种种仪规、戒律。这些学术交流促进了江苏地区的佛学研究水平迅速提高，江苏也因此而成为佛教在中国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传播、研究中心。

（二）

隋开皇九年（589）灭陈，结束了中国南北方分裂的历史，使中国重新归于统一。从这时起至1368年，除了五代时期的南唐以外，江苏地区基本上没有出现王朝政权。远离政治中心，使江苏地区的学术也失去了繁荣的动力，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但是，从隋唐以来，江苏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不断增长的局面。尤其是从宋代开始，江苏的教育事业大规模发展和普及，在许多村镇中也出现了私塾，“学在官府”、“学在豪门”的情况从此被改变。这些因素为江苏社会科学事业在明清时期走向鼎盛，并成为全国学术最发达的地区提供了有利条件。

唐代江苏籍学者曹宪、李善先后以对《昭明文选》的系统研究而名震京师。著名教育家、经学家陆德明著有《经典释文》等著作。刘知几著《史通》

对史学理论作了全面的整理。刘禹锡在其所著《天论》里提出了“天人交相胜”的辩证观点。五代时期南唐的徐铉、徐锴兄弟分别著有《说文解字》(校本)《说文解字系传》在东汉许慎研究的基础上把语言学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宋代，范仲淹和王安石都是著名的政治家，又是著名学者，他们勇于任事、关心民瘼、锐意改革的人格精神在其学术思想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范成大在诗歌研究、地方史志两方面都作出了贡献，著有《石湖诗话》、《吴郡志》。胡瑗是著名的“苏湖教学法”的创造者，他“分斋教学”因材施教的做法对当时和后来的教育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秦观著有人才学专论。叶梦得、洪兴祖、葛立方、吴可、尤袤、尤袤等人在诗歌研究方面也完成了一系列著作。

唐宋时期，江苏地区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唐天宝十二年(753)，佛教高僧鉴真法师成功地乘船渡海赴日本传播佛法。前此，他曾先后五次渡海赴日，皆因风高浪险而失败。鉴真抵达日本后，受到日本皇室及朝野上下的热烈欢迎，被尊为日本佛教律宗之祖。三百余年后，南宋淳祐年间，佛教高僧大觉禅师也携带佛像、佛经东渡日本传播禅宗思想，成为又一名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产生了积极和深远影响的中国佛学家。

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是为明太祖，并建都南京。江苏地区又一次成为全国的政治、学术中心。明永乐十八年(1420)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同时，为了表示遵从祖制，改南京为留都，并在南京保留了名义上的吏、户、礼、兵、刑、工的六部体制和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政治和学术中心再次北移。但是，江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日趋发达。据顾炎武分析，明末江苏的苏州、松江、常州三府人口约为全国人口的3%，但其交纳的田赋却占全国田赋总数的23%。从明代中期至清中叶，江苏在农业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以纺织业和贸易为中心的工商业也有了巨大的发展，吴锦“衣被天下”。江苏的教育事业在全国也处于领先地位。仅以科举考试的魁首状元取中比例为例，明代全国共取中状元89人，其中江苏16人，在各省区中居于全国第三；清代全国共取中状元114人，其中江苏49人，几占其半，为全国之首。此外，江苏还是当时全国的图书印刷出版销售中心，私人藏书量位于全国前列。这些因素为江苏的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在明清时期，尽管政治中心基本上处于北方，但江苏的学术事业却一直领全国之风骚，成为最发达的地区。所谓江苏人文荟萃的说法，即产生于这一时期，并延续至今。

明初，中央政府在南京设有国史馆。当时的南京，群贤毕集。朱元璋先后主持编制了《明大诰》、《御制护法集》。在宋濂主持下编修了《元史》。在解缙主持下，编修了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刘基著有富于哲理性的随笔集《郁离子》。朱权著有戏剧理论名著《太和正音谱》。明永乐年间，太监郑和奉明成祖朱棣之诏命，先后七次率船队出使亚非各国，随行成员巩珍、费信分别完成了《西洋番国志》、《星槎览胜》，反映了当时国人对世界的认知水平。

从明代中期开始，江苏地区掀起了一股以反专制反理学为目标的思想解放的风暴，其影响逐渐推向全国。当时，在王阳明（守仁）、湛若水等人的倡导下，江苏的书院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形形色色的讲学活动频繁。所谓书院，通常以教学为主，同时也是学者们聚集在一起切磋学问的场所。参加讲学的著名学者有王阳明、湛若水、王艮、颜钧、罗汝芳、何心隐、李贽、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徐光启、钱一本等。讲学的内容既包括受到明朝政府公开支持的理学，也包括被理学视为异端的“心学”以及反理学的观点。如王阳明倡导“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心学”。王艮倡导“百姓日用即圣王之道”。顾宪成等人倡导“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理学精神。李贽倡导“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新哲学、伦理观。王阳明（守仁）、王艮、李贽等人均有文集或言行录问世。由于部分学者在讲学活动中涉及对政治的臧否，曾多次遭到政府的镇压。何心隐、李贽等人因此被逮而死。但蓬蓬勃勃的讲学活动仍旧坚持了下去。并且正是在书院和讲学的基础上，产生了如东林书院、复社等在当时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学术社会团体。明崇祯六年（1633），复社在苏州虎丘召开社员大会，东南数省来者竟达千余人之多。

反专制反理学的思想解放运动打开了学者们的视野。过去受到鄙夷的小说、戏曲、民间文学、民俗民风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在上述领域中有影响的著作有徐弘祖著《徐霞客游记》、冯梦龙著《三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序言、《太霞新奏》以及所编民歌集《山歌》、凌濛初著《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序言、《南音三籁》、《谭曲札记》，李贽对小说《水浒》的评点、叶昼托李贽名评点《容与堂刻本 忠义水浒传》，毛宗岗编订《第一才子书三国演义》、金圣叹对小说《水浒》、戏剧《西厢记》的评点、沈璟著《增订查补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徐复祚著《曲论》等。

此外，江苏还出现了大量优秀的图书馆学、中国语言学、中国古代文学

研究、军事学、法学、美学、宗教学等方面的著作 如钱谦益编著的《列朝诗集小传》、《钱注杜诗》、《绛云楼书目》 毛晋著的《汲古阁珍藏书目》 黄虞稷著的《千顷堂书目》 顾起元著的《客座赘语》 李登著的《摭古遗义》 唐顺之著的《荆川先生文集》 王世贞著的《艺苑卮言》 袁宏道著的《袁中郎全集》 张溥编著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徐祯卿著的《谈艺录》 何良俊著的《四友斋丛说》 徐师曾著的《文体明辨》 王鸣鹤编的《登台必究》 周筌等编著的《金汤借箸》 王肯堂著的《律例笺释》 计成著的《园冶》 王岱舆著的《清真大学》 张中著的《归真总义》等。

明代中期，先后经历了文艺复兴的欧洲诸国开始了全球性探险和扩张。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访问了南京，会见了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并指导协助徐、李分别把欧洲逻辑学著作《几何原理》、《名理探》译成了中文。不久，梵蒂冈天主教教廷又向南京派出了王丰肃、谢务禄等天主教传教士，结果招致了守旧派官员的不满，他们纷纷上奏朝廷，指责天主教教士来华有政治目的，天主教教义有违传统的忠孝伦理。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明政府下令把王、谢驱逐至澳门。江苏地区与欧洲之间的第一次文化学术交流遂告中断。

进入清代以后，江苏的学术事业有了进一步发展。明清之际的一些著名学者如顾炎武、顾祖禹、阎若璩等人不满理学的空谈，纷纷转向了实学。实学，又称汉学、朴学，其基本特点是重著述，轻讲学；注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反对主观立论的抽象演绎。实学最基本的研究手段是训诂考证，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历史学、语言学、图书馆学。顾炎武编著《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 顾祖禹著《读史方輿纪要》 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都是开实学风气的名作。实学的形成，得到了清政府的积极鼓励与提倡。清政府是一个由少数民族满族占据核心统治地位的政府，一方面它多次兴起“文字狱”，同时禁止结社同盟，竭力肃清汉人的反清思想；一方面又要大力弘扬文化事业，为巩固政权服务。实学的出现恰恰满足了清政府的上述要求。清康熙年间 开博学鸿词科 诏修《明史》、《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雍正年间 清帝胤禛亲自为南京钟山书院题写匾额“敦崇实学”。乾隆年间，诏修《四库全书》。这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江苏学术事业的发展，使得人文荟萃、学术发达的江苏地区成为实学重镇。实学在清乾隆、嘉庆时期达到鼎盛，时人称为“乾嘉学派”。而这一学派的绝大多数学者都来自于江苏地区，其学术方法、风格不胫而走，风行全国。而江苏地区的实学，又由于不

同地域学者的治学对象、治学特点的区别 形成了吴(苏州)、阳湖(常州)、扬州等众多的学派。属于实学的江苏主要名宿有：《说文解字注》的作者段玉裁,《广雅疏证》的作者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十七史商榷》的作者王鸣盛,《廿二史考异》的作者钱大昕,《廿二史札记》的作者赵翼,《尚书今古文注疏》的作者孙星衍,《广陵通典》的作者汪中,《古文尚书考》的作者惠栋,《经室集》的作者阮元等。

在古代文学、美学等领域中,江苏也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著作。李渔著的《闲情偶寄》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戏剧创作理论专著。刘熙载著的《艺概》系统总结了中国古代各文学艺术种类的美学理论。沈德潜、袁枚、赵翼、陈维崧、张惠言、周济、姚鼐、梅曾亮、管同、恽敬、阮元、李兆洛等人的著作,分别代表了诗坛格调派、性灵派、词坛阳羨派、常州词派、文坛桐城派、阳湖派、文选派等众多文学创作流派的美学主张。宋明以来的“诗话”研究传统和文学选注活动在清代得到了进一步发扬。江苏清代的讲学,在规模上和影响上均不及明代,但也有一些著名学者参与其事,如朱存、程恩泽、钱大昕、姚鼐等。

(三)

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1841年,英军侵入江苏地区。次年,中英两国在江宁(今南京)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江宁条约”。该条约规定:开辟江苏上海等地为中国对外通商口岸,允许英国人自由来华传教贸易。此后,美、法等国群起而效之,先后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类似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封闭的国门从此被帝国主义列强强行打开。

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民族灾难,同时又使中国人民认识到了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的重要。从这一时期开始,江苏学者就和全国人民一起走上了寻求独立富强的道路,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直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同样,江苏的社会科学事业在此期间也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吸收引进了一批新学科、新的学术研究方法,建立了一批专业性学术研究机构 and 学术团体,学术管理活动也初露端倪。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一些著名的江苏学者如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就

开始了“更法”、“改图”的探讨。他们从常州学派学者刘逢禄的今文经学里找到了托古改制的理论武器。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魏源著《海国图志》就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今南京）后，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也提出了一系列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技术文化的设想。此后，倡导变法图强、学习西方者踵继不绝，如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张謇等。杨仁山创立金陵刻经处，立志以佛教救国。谭嗣同曾在金陵刻经处学习佛学，他以“求仁成仁”的精神，献身于中国的改革事业。

在此期间，学术方法的变革、新学科的引进已经开始。马建忠借鉴英、法语言学的理论体系，在中国语言学中开始尝试建构语法理论。王国维最早译介了外国教育学原理。陈庆年著《中国历史教科书》改变了传统史书的纪传体撰写方式，较早采用了章节体。缪荃孙、柳诒徵在图书馆学领域中相继作了变革，向各种新学科的书藉打开了大门。20世纪初叶，为了推动教育事业的变革，中国教育会、江苏学务总会等一系列群众性学术团体在上海先后成立。大批学生、学者纷纷赴海外留学，然后带着西方学术教育的影响返回国内。学术界要求变革的呼声已成燎原之势。

在全国人民汹涌澎湃的变法和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清政府不得不于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制，改革教育体制，兴办新式学堂。江苏境内各种新式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的建立，以及在这些高校中推行的新式教育方式、新教学内容，为江苏现代社会科学学科分类奠定了基础，并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各种新式学术人才。1908年，清政府又颁布了《结社集会律》，首次从法律角度认可了各种社会团体包括学术团体的存在权利。

1911年10月，以推翻清朝统治为目标的辛亥革命在湖北武汉首先爆发，并迅速波及全国。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为江苏学术界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同年2月，清帝被迫宣布退位，从此结束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同年3月，在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里，首次规定了公民享有著作和结社的自由。这是又一次从法律角度对中国公民学术研究、讨论权利的肯定。从这一时期开始到1949年止，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始终是全国重要的学术研究中心之一。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江苏学者发挥了冲锋陷阵的重要作用。刘复先后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复王敬轩书》，尖锐批判了文化复古主义思

想。顾颉刚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中提出了中国古代史是“层累造成的”的“疑古”史观，对传统史学发出了挑战。顾颉刚、刘复、叶圣陶、魏建功等人共同发起了民歌谣谚搜集整理研究活动，开创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和民俗学的新局面。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在江苏上海出版。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史上，江苏学者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不少人为了宣传、捍卫马克思主义和追求真理，倒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张闻天著的《社会问题》一文最早提出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中国社会。周恩来著的《学生的根本觉悟》一文反映了正在形成中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人生观。恽代英起草的《少年中国学会苏州宣言》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青年运动的杰出文献。瞿秋白以其渊博的学识，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在军事学、中共党史、社会学、哲学、政治学、新闻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等各领域中都取得了杰出的研究成果。在这些学者中间还包括博古（秦邦宪）、陆定一、王学文、陈翰笙、胡乔木、乔冠华、孙冶方、胡绳等一大批优秀人物，他们在理论上都作出了极其可贵的贡献。

20世纪20、30年代，江苏地区的社会科学事业逐步朝形成完整的体系方向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学术研究机构，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国立中央编译馆、国立中央图书馆、民国政府国防部参谋本部战史编纂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出现了一系列集教学与科研职能于一体的高等院校，如金陵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东吴大学、陆军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无锡国学专科学校等。成立了一批重要的学术团体，如中国经济学社、中国社会学社、中国心理学会、中国社会教育社、中国儿童教育社、中国政治学会、军学社等。在上述学术机构、院校、团体里，荟萃了当时国内一大批知名学者如马寅初、蔡元培、黄侃、赵元任、王世杰、钱端升、高柳桥、潘菽、费孝通、萧孝嵘、艾伟、陈中凡、胡小石、陈寅恪、傅斯年、董作宾、蒋百里、杨杰、孙本文、李济、夏鼐、陈恭禄等。完成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如《中国报业史》、《儿童心理之研究》、《中国诗史》、《现代吴语的研究》、《社会学原理》、《江村经济》、《比较宪法》等，它们的问世标志着新闻学、心理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语言学、社会学、人口学、法学等一系列新学科的诞生。出现了几次较大的学术论争活动，在“玄学与人生观”大讨论里，丁文江、瞿秋白分别用科学的认识

论批驳了张君勱的“自由意志论”、“不可知论”。在“中国社会性质及前途”大讨论里，王学文、陈翰笙分别用历史唯物主义批驳了托派的悲观论点，指出中国社会当前的性质是封建半封建的，资本主义在中国是没有前途的。这一时期，江苏学者还组织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和学术试验活动，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陈翰笙、王寅生、张稼夫、钱俊瑞、秦柳方、薛暮桥、孙冶方、张锡昌等分别主持和参加的广东、江苏、河北、陕西、河南等地的农村调查，乔启明等组织的江宁淳化镇乡村人口调查，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组织的搜集全省民歌谣谚的活动，廖世承、陈鹤琴、陶行知、黄炎培等人分别从事的中学教育、幼儿教育、“生活教育”理论、“大职业主义教育”理论的学术试验等。在此期间，学术管理工作也初露端倪。民国初期，对各种社会团体的管理一直沿用清末实施的《结社集会律》。从 30 年代初开始到 40 年代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等机构在南京陆续颁布和修订了一系列关于全国社会团体管理的法令，由各级国民党党部对其进行管理，对各种社会团体的成立、审批，团体的改组、选举、宣誓、经费补助的方法等内容作了一系列规定。并首次出现了“文化团体”这一定义，规定其性质为增进学术教育与改良风俗习惯。必须指出，民国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制订的这些社会团体管理的法令，主要是为了从政治上对其加以控制和利用，因此贯穿这些法令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不允许任何团体从事危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活动，否则，就要被取缔法办。

1931 年 9 月，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1937 年 7 月，日本侵略我国的战争全面爆发。是年冬，江苏沦陷。江苏的许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社会团体先后内迁至西南地区的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置身于大后方的江苏学者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一方面积极投身于全民族的抗战事业，一方面坚持从事学术研究。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学者们在颠沛流离中忠于职守，坚持保护好带到后方的珍贵文物。吴贻芳等人在宋庆龄的领导下，带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院校的师生，投身于战时儿童救助工作。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学者巫宝三等人秘密从事了关于战时物价控制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

1940 年，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持下在南京成立。留在沦陷区的江苏学者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政权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著名学者王伯沆宁可饿病而死，拒不出任汉奸政权伪职，集中代表了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情操。从 1940 年至 1945 年，在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卵翼下

也成立了一些学术团体，如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会、中国广播事业建设协会等。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下，这些“学术团体”公然申言要为建设所谓“东亚新体制”服务，堕落成为帮助日本军国主义者奴役中华民族的工具。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四军勇敢地奔赴抗日第一线，挺进江苏，先后建立了以苏南句容和苏北盐城地区为中心的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学者队伍不断壮大。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在中共华中局党校发表了著名的演讲《论党内斗争》，从理论上精辟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内开展政治思想斗争时应采取的正确方针。刘少奇在给宋亮（孙冶方）的信中，反复强调了理论学习和研究的重要性。俞铭璜著的《新人生观》、邓克生著的《新经济学讲话》、萍瓊 胡绳 著的《二千年间》都是当时有着广泛影响的著作。恽逸群、邹韬奋、石西民等在新闻学方面 戴伯韬、吴天石等在普通教育学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理论贡献。此外，乔冠华先后在香港、重庆等地发表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国际形势评论文章。

1945年8月，日本军国主义者宣告无条件投降。至此，中国人民通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同年底，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官僚大资产阶级反动集团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还击，解放战争从此爆发。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不久，江苏和全国大部分地区均告解放。国民党残余势力逃往台湾，一部分学术机构也随之迁台，但是绝大部分江苏学者留在大陆与人民一起迎了解放。

（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

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结合当时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教育革命和宣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各项工作，江苏学者完成了一系列重要学术著作。胡乔木著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是中共党史研究体系的奠基作。陆定一的论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确地阐释了党对于文化学术工作的指导方针。孙冶方的论文《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在国民经济盲目跃进的前夕，清醒地阐明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周恩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和文艺工作会议上所作《论知识分子问题》报告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进行了科学准确分析 认

为他们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孙叔平著的《历史唯物主义纲要》狄超白著的《政治经济学讲话》薛暮桥主编的《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邓克生著的《商品自传》俞铭璜著的《共产主义人生观》，郭影秋、陆锡书著的《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罗尔纲主编的《太平天国》史料总集罗炳之著的《西方教育史》潘菽的一系列心理学研究论文杨周翰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都是这一时期涌现的优秀理论成果。学术考察调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尤以考古工作最为显著。南京博物院在曾昭燏的主持下，先后组织了对南唐二陵、淮安青莲岗文化遗址、南京北阴阳营古人类文化遗址的发掘，出土了许多珍贵文物。钱静人主持了苏南民歌的调查征集，吴天石主持了全省方言普查。50年代前期，江苏和苏联、东欧诸国的学者也开展过一些学术交流。

建国初期，江苏省接收并改造了部分原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机构，如金陵刻经处、南京博物院、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50年代末，又成立了历史、经济、哲学、教育、文学等研究机构。此后，历史、哲学、经济三研究所又合并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再加上各高等院校、驻江苏境内的解放军院校、解放军南京军区所属研究机构，初步形成了一个多学科的研究群体网络。学术团体和管理进一步专业化、职能化，出现了社会科学团体及专职学术管理团体。1958年，成立了南京哲学、经济、历史、教育四个学会的筹委会，同时成立负责管理学会事务的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筹委会。1962年，上述筹委会同时转为正式团体。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因素干扰，江苏学术界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52年，全国实行院系调整，江苏高校的社会学、政治学、新闻学、经济学（不含政治经济学）等系科被撤销，学科结构的合理性受到影响。从50年代后半期开始，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倾向逐步抬头，政治运动频繁，阶级斗争扩大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在实际工作中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1955年，公开批判了所谓“胡风反党集团”，江苏个别学者遭到株连。1957年进行的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中，江苏一批知名学者如高觉敷、朱偁、方之、高晓声等人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又在学术界进行了所谓“插红旗、拔白旗”批判“白专道路”的思想运动，严重挫伤了包括江苏学者在内的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学术研究积极性。1964年，孙冶方因坚持正确的学术观点，被作为“全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而遭到无情斗争和打击。此后，宣传斯霞“母爱教育”观点的长篇通讯报道和

罗尔纲的论文《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考》也先后受到有关报刊的公开批判，前者被斥为资产阶级思想，后者被视为为“叛徒”辩护。同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也掀起了一股抓“叛徒”的逆流，政治生活已显得极不正常。不少学术刊物被迫停刊。1966年5月16日在极左路线支配下以及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的蓄意破坏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该通知极为错误地要求揭露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等领域中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从而公开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从1966年至1976年长达10年之久的空前文化浩劫中，江苏的学术研究机构被撤销，学术团体全部被解散，学校被迫停止教学和科研。许多学术研究设备、资料和学者的研究心得被付之一炬，或大量流散。许多学者遭到错误的批判，被受蒙蔽的群众围攻、斗争、游街，有的被以各种名义非法关押，长期失去人身自由，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正常的公开的学术研究活动基本停顿，极少数研究则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1971年9月，林彪反党集团自我爆炸。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反党集团，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5月，《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胡福明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次大讨论为进一步全面开展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拨乱反正进行了理论上舆论上的必要准备。同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盛会，会议向全党全国发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伟大号召。1979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中央理论务虚会议，邓小平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报告。同年，江苏开始纠正反右扩大化的错误，被错误地划为右派的学者全部被平反。从此，江苏的学术事业进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197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研究室成立。此后，江苏省政府、省人大，所属各部委、办、厅、局及各市、县也相继成立了决策研究机构。1978年10月，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恢复建制，1980年，该所又扩建为省社会科学院。1978年，省社科联恢复活动。1979年10月，江苏省图书馆学会成立，这是省内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成立的第一个省级学会。同时，原南京哲学、经济、教育、历史4个学会也相继恢复活动，并升格为江苏省省级学会。至1990年底，江苏省成立的各种省级学会、研究会已达130余个。部属、省属高等院校，中共江苏省委暨各市、县党校，解放军驻苏院校的学术研

究活动也蓬勃开展。一支由众多人数和层次的学者、学术团体、学术研究机构组成的 覆盖了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语言文学、历史学八大类 50 个学科、结构合理的江苏学术研究队伍已经形成。

1978 年到 1990 年的 13 年间，体现江苏学者最新成就的学术著作不断涌现，在学术界反响很大。如孙冶方著《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及其续集，薛暮桥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孙叔平著《中国哲学史稿》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由费孝通担任学术指导、王淮冰主编《小城镇、大问题》高觉敷著《西方近代心理学史》莫绍揆著《数理逻辑教程》顾准著《希腊城邦制度》钱钟书著《管锥编》、《谈艺录》任中敏著《唐声诗》、《唐戏弄》匡亚明著《孔子评传》韩儒林主编《元朝史》等等。一些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如刘国光、汝信、厉以宁、陈白尘、钱仲联、钱南扬、陈瘦竹、王绳组、蒋孟引、顾树森、斯霞、夏基松、吴调公、范存忠、陈嘉、唐圭璋、徐复、孙望、陈辽、刘毓璜、茅家琦、李乾亨、萧焜焘、张梦白、程千帆、廖序东、叶子铭、王觉非、汪长炳、刘崧生、鲁洁等也分别在理论上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从 1978 年至 1990 年的 13 年间，江苏学术界围绕经济工作这一中心和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个基本点，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学术讨论活动，如关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讨论会、乡镇企业讨论会、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全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第一次讨论会、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邓小平文选》座谈会、江苏小城镇研讨会、纪念曹雪芹诞生二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全国首届民国史学术讨论会、“积极提高苏南、加快发展苏北”系列讨论活动、纪念瞿秋白就义五十周年讨论会、航海家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五百八十周年纪念大会、江苏省理想道德教育学术讨论会、国际元史学术研讨会、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发展江苏外向型经济研讨会、明清小说金陵研讨会等。

在从 1978 年至 1990 年的 13 年间，江苏学术社会服务的领域不断扩大，学术研究手段日益更新，学术普及广泛活跃，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和改革开放的结合日益紧密。全省举办各种学术演讲、报告会、讲座、学习班，开展各种学术试验和学术调查、考察，从事社会力量办学等工作，累计超过 5000 余次，参加人数达数十万人次。广播、电视、摄影录像、各种文体表演比赛等传媒和艺术形式广泛用于学术社会服务。电子计算机应用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新闻学、语言学、文学等学科研究领域得到普及。远红外遥感摄影技术被用来进行大面积古文化遗址普查。

这一新的时期，江苏省学术界与海外学术界的交流更加频繁、密切，交流的学科领域不断拓宽。交流的形式有学术参观、访问、座谈、演讲、共同开展学术课题研究等。交流的国家 and 地区包括苏联、匈牙利、荷兰、墨西哥、美国、英国、日本、法国、联邦德国、瑞典、澳大利亚、印度、意大利、加拿大、西班牙、挪威等国以及香港、台湾等地区。

1978 年至 1990 年的 13 年间，江苏的学术管理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科学、合理的体系。在社会科学学术团体管理方面，形成了以江苏省社科联为主体的省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省科学技术协会、省教育委员会、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协同参加的网络化管理。1990 年始，省民政厅承担学术团体的登记管理职能。从 1984 年开始的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迄今已举行了 3 次。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实施包括“六五”、“七五”两个学术周期规划，并正式成立了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和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管理体制更加完善。从 1986 年开始实行的全省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专业职称改革标志着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合理化、科学化和规范化。

（五）

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其任务是“解释现实的社会现状，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分析现实的社会运动”（《瞿秋白选集》第 11 页，1955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综观两千多年来江苏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业绩，主要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为人民的利益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努力奋斗。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人、社会的主体。社会科学工作者宝贵的品质就是关心、同情、支持和维护人民的利益，申张正义，具有较强的民主性。哲学、社会科学虽然门类众多，但都是从各个方面直接或间接地为广大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古代许多学者在野时关心民瘼，著书立说，当政时就努力组织人民发展生产，尽力减轻人民所受的剥削和压迫。在孙武的《兵法》中，认为决定胜负的五件大事“道、天、地、将、法”中居于首位的是“道”，而“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指的就是贤明的政治，包括“亩大、税轻、国君俭而富民”、“视卒如婴儿”、“如爱子”。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批志士仁人都企图对改变现状有所作为。无论是范仲淹的修海堤、兴学校、办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进行以“均天下之财，使百姓无贫”为目的的熙宁变法，都是为了使当时农民摆脱“丰年不饱

食，水旱尚何有”的困窘状态。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还曾作过“均分草滩”的试验。李贽提出“人能自治，不待禁而治之也”，顾炎武主张用“群治”代替“独治”，“存清议于州里”已具有一些民主主义的启蒙思想的因素。到了近代，面对着日益深重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从龚自珍、魏源、洪秀全、洪仁玕、冯桂芬、薛福成、王韬、谭嗣同到赵声、柳亚子、章太炎、孙中山，从各个方面不断地摸索救国救民、强国富民、振兴中华民族的道理，他们的奋斗精神是可歌可泣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以后，一批革命的知识分子获得了新的思想武器，开始了新的战斗。瞿秋白、恽代英、李大钊、陶行知、张闻天等就是他们中的卓越代表。在阶级社会里，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人难免要触犯当权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他们往往“少达而多穷”（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甚至要受到迫害和虐杀。这些忠诚的学者不为虚名，不为私利，唯独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坚持真理。王充“居贫苦而志不倦”范缜坚决拒绝“卖论取官”李贽“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诮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李公朴与史良是著名的抗日领袖“七君子”，抗战胜利后，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昆明。这种战斗精神，在建国以后仍然不断得到发扬。孙冶方受到康生、陈伯达的政治迫害，被关进监狱7年之久。释放时他宣布“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性，三不改变观点”。这些“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正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鲁迅《关于太炎先生的二三事》语）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

第二，从实践中寻求真理，坚持理论和实践相一致的认识路线。在鬼神迷信盛行的古代，孙武就提出战争的胜负“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用相似的事作类比）不可验于度（用日月星辰作占卜）必取于人”和“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他的著作正是从大量的军事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王安石治学“自诸子百家及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向”，他在做地方官的十六年间，不断兴修水利、借贷官库粮食给农民、改革茶叶专卖制度，都收到了实效，以后疏浚黄河又获得成功。这些实践都坚定了他推行变法的决心，使他成为我国古代的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明清间的顾炎武、顾祖禹、徐霞客等都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数十年如一日讲求“实学”的学者。毛泽东在青年时就十分推崇顾炎武，说他“经世要务，一一讲求……事关民生国命者，必